

名著咀英

安立志专栏

王伦这个一把手



1980年,方成先生有一幅著名漫画——《武大郎开店》。店里的伙计说:“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,比我高的都不要。”一时成为嫉贤妒能的代名词。《水浒传》里的武大郎虽是卖炊饼的,并不曾开店。王伦是梁山泊的创始人,长期担任山寨的一把手,他的用人方针,倒极像方成笔下的武大郎。

这王伦不过“是个不及第的秀才,因鸟气,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”。后来虽又来了宋万与朱贵等,因本事均极平常,对其并不构成威胁。因此,王伦已经习惯了在庸人堆里发号施令,不思进取,优哉游哉地做他的小寨之主、小国之君。自从柴进介绍林冲上山,才打破了山寨的平衡,搅乱了王伦的美梦。

王伦等人落草梁山,对于济州地方当局来说,是一股无法容忍的“黑恶势力”,官军对梁山的剿灭是早晚的事。按说,王伦作为一寨之主,应当招兵买马、广纳贤才,只有壮大了自身力量,才能建立稳固的“根据地”。林冲上山之初,王伦碍于柴进的面子,同意收留,但却把林冲排名在朱贵之前,宋万之后,坐了第四把交椅。当他得知林冲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,自忖道:“我又没十分本事,杜迁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。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,他是京师禁军教头,必然好武艺。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,他须占强,我们如何迎敌?”正是这种气量褊狭、嫉贤妒能的阴暗心理,促使他对林冲下达了逐客令,借口弯弯曲曲,无非是“小寨粮食缺少,屋宇不整,人力寡薄,恐日后误了足下”云云。虽然在杜迁等人的劝说下,仍然要林冲在冰天雪地的三日之内,上交“投名状”(一颗人头),作为上山条件。由此可见,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一旦做了一把手,往往如同武大郎开店,将一切有可能“比我高”的伙计统统拒之门外,其所选择和信任的人,大都是一些虽非“狗熊”但绝非“英雄”的俯首听命

之輩。这就是在一些地方往往庸人腾达、英雄气短的基本原因。

王伦的雪天三限,将林冲逼到绝境,直到第三日碰到杨志。王伦见两人武艺相当、势均力敌,于是又动起了歪主意,“若留林冲,实形容得我们不济,不如我做个人情,并留了杨志,与他作敌。”不要小看了王伦的心机,在一些地方和单位,如果一把手是个平庸之辈,他往往会作出两种考虑,手腕差一点的,就是将有德有才者冰冻冷藏、投闲置散,不赋予权力,不分配资源,不透露信息,使之淡出权力中心,淡出公众视野,使之成为无足轻重的边缘人或逍遥客。手腕高一点的,是想方设法在同僚与部属之间制造对手,制造摩擦,制造矛盾。不过,这样的安排并不同于“三权分立”,而是一种互毁与内耗。如此一来,同僚与部属转移了焦点,消耗了能量,降低了威信,才便于一把手以“永远正确”的面目,进行制约与平衡,从而永保“仲裁者”、“裁判员”或“山寨老大”的地位。王伦在林冲与杨志之间,一拒一迎,一冷一热,就充分暴露了这种小国之君的卑劣动机。这种档次的一把手,还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拉帮结派,或地域帮,或系统帮,或同学帮,王伦在危机之际,面对林冲的尖刀,不是也曾高喊:“我的心腹都在哪里?”作为一种权力基础、一种生存智慧、一种倾轧手段,不要说这类团伙作用不大,在任何单位,四五百同党,纠合起来,对“非我伙内”集中投下“不称职票”,都会构成重大威胁。“白衣秀士”王伦,并不白给。

然而,对于梁山来说,用人政策事关存亡,嫉贤妒能,为丛驱雀,闭关自守,自相残杀,只能是死路一条。王伦的自寻死路,晁盖等人的上山,梁山才真正出现了“蓼儿洼内,前后摆数千只战舰摩崖;水浒寨中,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”的光明前景,从而开辟了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。



小说写作为主。

陈中华,大众日报高级记者,国家一级作家,中国作协会员,山东作协全委会委员,业余以

少年馊事

陈中华专栏

偷书被捉记

首先需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找块遮羞布:一名人就说过,偷书不算偷。我的少年时代与当下非常相似,没人读书。差别仅在如今是鼓励读书没人读,那时是封书焚书不许读。枣庄又是个煤城,连局长、矿长、工程师恐怕也不懂得什么叫人文、什么叫启蒙,可想我们了。

全市唯一曾对外开放的市图书馆已封馆多年,书也不知弄哪去了。一天,一同学告诉我一个秘密:一小兄弟得知了图书馆的书籍哪里了,能偷出来。哦,真是个大大的情报,天大的喜讯!我们4个人就商量着怎么一起去偷书。

书原来就藏在市委办公院一隅一大房子里。当时那院全是平房,市委也不像现在的各单位,都把得很严不让人进。那时把门的就一个传达,我们很容易溜进去了,顺利从后窗攀入书库。哟——我们全呆了!

那间房有现在的四室两厅那么大,全是书呀!那一排排书架——尽管书籍皆布满灰尘——也证实了一个史实:“文革”时也不是都焚书,尤其下面的工农兵群众内心还是很崇拜书的,视为珍宝,先藏起再说。

少年的我绝对是个书盲,压根没听过“名著”这词,更不知何谓红楼梦、唐诗宋词什么的。偷什么呀?只好满库里选。头一回不敢多偷,记得只选了三本:一本长篇小说《古城春色》,写解放北京的,又是打仗,又是“北京”,挺吸引人的;另一本叫《非洲民间故事选》,读了几段挺好玩的;第三本书名早已忘记。

攀窗暗窥,似乎外面人很多,偶尔有男人赶到库房边撒尿。每当有人来撒尿,我们就轻喘气,怕被听出库里有人。似乎还不是逃跑时机,我们就席地看起书来。慢慢听外面人少了,我们中为首——也是个头最高的一个,轻轻推开窗户向外探望,探了几秒钟,啥也没说,攀上窗独自跳出去跑了。4人中我的个头为老二,我挡住别人,第二个跑了……这一刻,在那空阔的院内有一奇妙的景观:4个孩子排成一线往外跑,每人都夹着胳膊,明显衣服里揣了什么,但没人拦我们。那时,都对孩子挺好的。

首战告捷,我忍不住将情报透露

给另三位同学,都很激动,考虑到晚间院内人少更隐蔽,约定当晚由我当向导再去偷书。其中一同学年长一岁,爸爸是当时市里一大官,但同学间没感觉他有什么优越的,倒是感觉他有一只我们都没有的手电筒有点几优越。下面的故事将以他为主,我权且给他起个名叫“手电筒”吧。

不想,晚间偷书才不隐蔽哩——正遇上一个去撒尿的人,他发现我们“鬼鬼祟祟”了。

我们被带进一个多人办公室,我们都不会抵赖,事先也没商量万一被逮如何应对,立即都坦白了是来偷书的。

审问者先是发现手电筒裤兜里的手电筒,说:“哟,还带着手榴弹!”手电筒说:“哪是手榴弹——手电筒!”对方说:“噢——阔,还有手电筒。”

然后逐一审我们叫什么?哪所学校?几年级几班?父母叫什么?问到手电筒时,那帮人逐渐兴奋了,问点都集中于他了。说,你爸爸叫某某某?你是某某某的儿子?不可能,不可能……手电筒越是拼命证明自己未撒谎,对方就越表示怀疑,说,既然是某某某的儿子就考考你,你有几个妈妈?手电筒回答,我有两个妈妈!哪两个妈妈?手电筒就说,有现在这个妈妈,老家还有一个大妈……

当时年幼,丝毫不解审问者心理。后来知道,手电筒的爸爸“文革”中是一风云人物,常被造反派批斗,也常被另一派推做领袖,知名度很大,而又恰被群众传说解放后与家乡前妻离婚,娶了年轻漂亮的新媳妇。与当下电视观众心理一样,那年头群众也对“进城换老婆”的故事很感兴趣,但毕竟传说不详,这回可算是寻到一个了解手电筒爸爸婚史的绝佳时机。

我们被问什么就回答什么,就是希望能坦白从宽,千万别告诉父母、老师。对方将手电筒问透了,让我们每人都写保证书,也承诺只要不再来偷书就替我们保密。

以后是我们4人忐忑不安的日子。结果,人家确实没反映给我们老师、家长。如今回忆起来,那时的人们可能也是喜欢读书的孩子,或许也以为偷书不算偷。

江湖再见

韩松落专栏

灵光一闪的萌

从“程序员之歌”出现在微博上,到“蓝精灵体”成为各行业的吐槽之歌,不过短短几天。相比同时期上映的《变形金刚》、《哈利·波特》,“蓝精灵体”不只提供怀旧契机,也提供了供人代入的描红模板,而和此前的“淘宝体”、“凡客体”比起来,“蓝精灵体”以怀旧为借口,为这种网络表达加入了一点作料:萌。

《蓝精灵》漫画和动画,其实就是典型的“萌”的产物。这个由比利时漫画家沛优和夫人在1958年创作出来的世界,是一个充满幽闭感的桃花源,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与世隔绝,倒不如说是与成人的世界隔绝,精灵们生活在那里,没有成人的烦恼,他们的职责就是做各种青春游戏,格格巫和阿兹猫提供的危险,只是为了让这个青春世界在遭受短暂威胁后,更合理合法地萌下去。

所以,当年的《蓝精灵》动画连续剧的主题歌,能借助《蓝精灵》电影的上映,酿就“蓝精灵体”,而且在短时间内获得这样广泛的共鸣,并不奇怪,因为,在成人世界里翻滚太久的七零八零后,需要偶尔“萌”一下,需要用它调侃自己的寄身之所,算作片刻的喘息。

其实,“萌”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偏向贬义的词语。因为,我们的文化里,男女一旦被认成年,就要接受各种约束,在行为上表现得“像”个成年人,一旦不像或者不那么像,就会遭遇谴责,甚至得接受利益上的损失。莫少聪和孙兴涉毒事件,是一

个典型的例子,同为港星,同样因为涉毒而被法律制裁,但孙兴在事发后召开了一个严肃的道歉会,事先准备非常充分,穿黑西装,背诵措辞严谨的道歉声明,而莫少聪在事发后,表现得非常慌张,最后还跑回香港去召开道歉会,道歉会上,穿的是一身白衣服,种种表现,让公众十分不满。联系他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、不认儿子、到处猎艳,为了拍摄纪录片倾家荡产等等的表现,人们认定了,他是一个不肯走出漫长青春期的,人们不愿意原谅的,不完全是他吸毒,而是他这种孩子气的人生表现。

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内地,处在剧烈的大动荡之中,我们要用十年时间,完成别的国家在一百年里完成的任务,竞争激烈到用白热化已经不能形容,内地的中国人,必须要被逼着长大,至少,“像”个长大的样子,模仿之,伪饰之,即便内心千疮百孔。“萌”的种种表现,几乎成为有罪的,像阿甘、雨人、mary&max这类有缺陷的,不愿意被时代潮流席卷的人物,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,台湾青春片会在内地遭遇恶评,被认为是台湾社会息元气渐弱的表现。

于是,我们也只能偶然地、灵光一闪地“萌”一下,借助“蓝精灵体”,模仿童年,讥讽成年,对各种近乎苦役的工作表示一下短暂的不满,借此和远处有着相同感受的人们获得共振,随后,继续面无表情地投入自己流水线一样的工作中去。

呼吸之间

刘亚伟专栏

多少算够



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个流传很广的小故事,一个中国老太太遇见一个美国老太太,中国老太太感慨道:“我一辈子省吃俭用,终于把买房子的钱攒够了,在我60岁的时候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漂亮房子。”美国老太太则说:“我20岁刚结婚时就向银行贷了一大笔钱,买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,感谢上帝,我终于在60岁的时候把银行的钱还上了。”这个故事形象地表明了当时中国人与美国人消费观念的差别,意在教育中国人,要学会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生活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短短十几年之后,故事里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已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信奉,信贷已经成了中国人购房买车首选的支付方式。

伴随着信贷消费的普及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,中国人被压抑了多年的欲望空前地释放出来,现在,许多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中国人已经变成了轿车的驾驶员、大屋豪宅的拥趸、乘坐飞机和高速列车的旅游者、经常出入酒楼餐馆的用餐者、购物中心和大型超市的购物者及一次性用品的消费者。

跨入新世纪的中国人发现,他们已经身处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,2010年,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,不久前似乎还遥不可及的日本人,已经被抛在身后。

具有嘲讽意味的是,这巨大的转变除了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外,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一种满意的生活。不要说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失业的大学生,就是那些貌似成功的城市白领和企业高管也都忧心忡忡,月工资6000元的人抱怨月收入还买不了一平方米住宅,认为他的收入至少应该翻番,那附他的苦恼和忧虑才会解除;而年薪50万的人则认为,如果他的年收入能达到100万,一切就会更好了……没有人满意自己的收入,没人觉得自己手中的钱够用。

曾有人做过研究,发现收入与幸

福之间的联系是相对的也是很脆弱的,有人说得好:“消费就是这样一个踏轮,每个人都用谁在前面谁在后面来判断他们自己的位置。”

多少才算够呢?亚里士多德早在2300多年前就已经看到:“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。”当一种需求被满足的时候,一个新的需求又代替了它的位置。而且消费是会上瘾的,起初的奢侈品很快就会成为必需品,而新的奢侈品又在等着你去拥有,每一个新颖的东西都会被更新颖的东西所取代。

时尚洋房,带有恒温游泳池的别墅,屋里装满暖气、空调、冰箱、微波炉、烤箱、衣物烘干机,出门有轿车代步,乘坐飞机满世界旅行——这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美国式的生活模式。现在美国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的7.3倍,这是不是意味着,中国人把眼下的生态环境再继续恶化7.3倍,也许才有可能接近于美国人均的生活水平?然而中国现在的生态与资源状况已经极度不堪,全世界也没有这么多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供人挥霍。

也许有人会说,人类不是正绞尽脑汁寻找清洁的替代能源吗?不错,这种替代能源的确找到了并且用上了,那就是核能源。但是核能源真的清洁吗?有人已经指出:核废料是万年不死的魔鬼——因为用来当燃料的放射性物质太稳定了,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大自然无法消解它。比如这次日本福岛核电站使用的铀,其半衰期是24000年,而铀的半衰期则是7.1亿年。人类的文明史大致是五六千年,以二十年算一代,不过才二三百代。而铀衰减一半就需要1200代人的时间,铀衰减一半则要3500万代人的时间。我们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发展出核电站,留下的核废料将危及上千代甚至上千万代,这是多么可怕和不道德的发展!面对这可怕的后果,被欲望驱使着末路狂奔般陷入一种无法自拔境地的国人应该清醒了。



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

兵,资深报人,现为自由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、科普读物等十余种。
刘亚伟,笔名亚子,北师大研究生学历,原籍曲阜,下过乡,当过